

五四时期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与 新思潮的传播

杨 娜◎著

WUSI SHIQI

CHU ZHONGDENG JIAOYU JIAOSHI QUNTI YU

XINSICHAO DE CHUANB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五四时期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与 新思潮的传播

杨 娜◎著

WUSI SHIQI
CHU ZHONGDENG JIAOYU JIAOSHI QUNTI YU
XINSICHAO DE CHUANB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时期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与新思潮的传播 / 杨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353 - 6

I. ①五… II. ①杨… III. ①中小学 - 教师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①D693.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89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18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海南大学 2011 年青年基金项目“五四时期教师群体
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qnjj11-23）成果

本书出版得到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助

摘 要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阶段。知识界在反思历史沉痛教训的基础上,认定要实现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必先要寻求国民性的根本改变,从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说,由此出现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潮流。新思潮的传播从外到内深入每个人的生活及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实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基于此,关于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的研究多为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亦是相当丰富。然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学界多集中在新思潮传播的意义上,而对于新思潮传播的具体过程、谁具体承担了新思潮传播的角色和任务等问题则关注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可能与空间。本课题就尝试以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场模式为理论依托,对五四时期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与新思潮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本书由五章和余论构成。首先,本书从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新思潮传播应具备的四大因素,及这四者的关系。其次,本书具体分析了精英知识人群体出于忧国忧民的目的,引入了大量的新思潮,形成了五四时期新思潮涌现的局面。但是,精英知识人囿于身份与社会角色的局限,导致他们对于新思潮的传播只能影响到部分的普通知识人,而无法直达民间,形成了新思潮传播的困境。由此,也决定了精英知识人群体只能充当新思潮的倡导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以上是本书论证的逻辑起点,也是本书第二章的具体内容。再次,第三章,笔者将视角放在了新思潮传播者的探讨之上,虽然精英知识人群体对新思潮的传播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受到精英知识人群体影响的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则不然,他们不但具有新思潮传播的主客观条件,而且还有传播新思潮的主观动力,这些条件将他们构建成为新思潮传播的当然传播者。第四、五章主要论证了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对新思潮的传播及影响,分析了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传播新思潮的主要路径、能将新思潮植人民间的主要原因以及新思潮的传播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从而从侧面肯定了初中等教育教师

群体在五四时期对中国社会起到了巨大作用。最后为余论部分，主要阐述了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在“五四”历史中的合力作用，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内部的合力，二是该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所形成的合力，从而肯定了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虽然是一个普通民众所构成的群体，但是他们却和精英群体一样在创造历史、改变历史，从而证实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

ABSTRACT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acts 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fter reflecting on the history's painful lessons, the intelligentsia cognized that the national character should be radically changed to realize the true modernization. Aiming at this end,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theories were introduced, which ultimately grew as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trend to promot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t that time. Such new thought trend spread from the external to the inner of the nationality and penetrated deep into almost everybody's soul, which awoke the people and led to the great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refore, the new thought trend of May Fourth period absorbed the intelligentsia and arose many research. However, almost all of the former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preading of new thought trend but neglected the spreading process, in particular the behaviour agent who responsible directly to such spreading and the relevant agent behaviour mechanism. Such status ignites the present research. Principally,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ors to the spreading of the new thought trend in this thesis. Technically, the Marlene Teske field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was largely utilized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1. The limited effect range of the Elite's Group make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ors, who contact extensively the students and therefore the people connected to the students, must be the mainstay to spread the new thought trend.
2. The subjective desire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ors urges themselves to spread the new thought trend.
3. The broad and deep connection among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

ucators ensures that the resultant force can be developed to spread the new thought trend quickly and robustly.

The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ors, who are commonly thought to be not social elite but ordinary people, further verifies the truth of "People make history" .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三) 相关概念	(9)
(四) 研究思路及方法	(15)
(五) 主要特点与不足之处	(19)
第一章 历史的楔子：基于五四新思潮传播的某些思考	(21)
(一) 关于思潮	(21)
(二) 思潮的传播模式	(23)
第二章 知识人精英群体与新思潮的涌现及其传播困境	(27)
(一) 知识人精英群体的界定	(27)
(二) 新文化运动：近代知识人精英群体对社会发展寻求的 新高点	(28)
(三) 新思潮的涌现及特点	(33)
(四) 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传播新思潮的困境	(35)
小结	(44)
第三章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传播新思潮的条件及动力分析	(48)
(一)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具备传播新思潮的主体条件	(48)
(二)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具有传播新思潮的客观优势	(55)
(三)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传播新思潮的主观动力分析	(67)
小结	(72)

第四章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对新思潮的传播	(75)
(一)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传播新思潮的受众范围及划分	(75)
(二)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对亲友群体的新思潮传播	(76)
(三)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对学生群体的新思潮传播	(81)
(四)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对社会民众的新思潮传播	(100)
小结	(109)
第五章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新思潮传播的影响	(113)
(一) 对民众的影响：人的现代化	(113)
(二) 对社会的影响：社会的重构	(119)
(三) 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历史的张力	(125)
小结	(137)
余论 “五四”的历史与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的作用	(144)
参考文献	(149)

附 录

图：

- 图 1 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系统 (11)
- 图 2 壬子癸丑学制中初中等教育的范围 (12)
- 图 3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与社会各群体的关系 (14)
- 图 4 思潮的三种基本形态 (23)
- 图 5 马莱茨克关于信息大众传播场的模型 (23)
- 图 6 杜威在华期间在江浙地区各场所讲学的分布比例 (39)
- 图 7 广东省民国元年至民国 18 年初中等教育教师增长趋势 (57)
- 图 8 1922 年部分初中等教育学校闹风潮原因分布 (143)

表：

- 表 1 杜威在华期间在江浙地区讲演目录统计 (37)
- 表 2 1912—1923 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含附属小学）教师对待
新思潮的态度统计 (51)
- 表 3 广东省民国元年至民国 18 年初中等教育概况 (56)
- 表 4 民国元年至民国 14 年广东省初中等教育学生人数统计及
生师比汇总 (60)
- 表 5 1917 年教育部公布小学教员俸给表 (63)
- 表 6 民国元年 6 月至民国 6 年 6 月浙江第二中学校历届毕业生简明
状况 (66)
- 表 7 1915 年 4 月至 8 月黎锦熙与毛泽东的交往汇总 (88)
- 表 8 民国初期部分初中等教育教师返乡办校与助教统计 (106)
- 表 9 关于中共第一批党员在入党前的初中等教育教学经历统计 ... (130)
- 表 10 1922 年 6 月至 1927 年中共党员数量统计 (134)
- 表 11 1922 年各类学校闹风潮数目统计 (139)
- 表 12 1922 年部分初中等教育学校闹风潮原因统计 (140)
- 表 13 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中各群体在新思潮问题上的互动
关系 (145)

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历史既可以是曾经鲜活的过去，也可以是如今陈旧的史料。史料收集整理存在差别，会带来历史还原深度的差异；同一史料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式迥异，也可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面貌。回望距今 90 余年的五四运动，由于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性历史地位，史学界对其的研究呈现出“量多面广”的特点。“量多”是指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可谓是汗牛充栋；“面广”则是指在研究的内容上，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精神意识领域，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无可否认，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无论在研究视角上还是在史料的发掘上，都给笔者的论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但是，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增加及研究内容的拓展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相反，只能说是解剖了历史的一个层面。因为史观的常新会给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和视角。过去学界对“五四”的历史，是以宏大叙事的历史观来进行解读的，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全方位的分析来探求“五四”，这一研究特点无疑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从宏观的角度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及必然性。但是，要还原和研究这段将文化运动创生为政治历史性转折的历史，可以是多维度的。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关于五四历史的研究可以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跳出传统的政治性的预先设定的叙事习惯，认识到“五四”不是一个既定的历史概念，而是应该将它还原成一个过程，一个产生新的政治目标的过程。这就有赖于研究者改变对原有常识和观念的认识。曾经学界对于“五四”的界定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并把这个界定作为一个政治常识来看待。这种常识的获得多源于社会对于政治权威的信任和尊重。但是，这场运动具体是如何体现其启蒙性的，启蒙过程中参与的群体、思想及政治博弈等因素是如何体现的，这个

转折在微观层面是如何形成的,等等,类似的问题却往往被民众所忽略。其原因就在于民众太理所当然地去接受常识,却遗忘了对常识本身的探究。这是笔者对“五四”的一点反思,也是将本书的研究时间段限定在五四时期的一种史观上的考虑。

历史是怎样创造的?这是一个极富思辨性的话题。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社会都会面临各种偶然的、未遇见到的、新的、生气勃勃的和革命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形成的基本原动力就是人类生活的需要。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然而,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活动,往往都是有意识的,有某种目的的,是现实的。因此,人在参与历史过程时,不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他们总是通过自身的追求、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历史。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①这说明,用因果单向史观去解释历史是非常蹩脚的做法。历史事变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造成的总结果。在这些“力”中间,有精英人物的领袖力,有普通民众的边缘作用力;有先进者的推动力,有保守派的阻力;有团体的组织力,也有团体间博弈的场域力;等等。而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由于受到宏大叙事史观的影响,学者们多习惯于将研究视角集中于精英人物、重大事件等,而对普通民众的详细研究则寥寥无几。如在“五四”人物的研究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精英人物和高等教育知识人^②群体已经被研究得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1—462页。

^② “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差异问题:“知识人”这个名词是余英时提倡的,他在《士与中国文化》第2版的序中指出“知识分子”原是一个中性的词,但是后来变得富有政治色彩,是一种阶级身份,因此他主张用“知识人”一词替代“知识分子”,他的意思是人的地位应受到尊重。对于余英时的观点,笔者不是完全赞同。笔者认为“知识人”与“知识分子”实质上都是通指以知识谋生的群体。就“知识分子”而言,它强调的是这个群体是构成社会的一个单元体,是一种客体性的体现,而非余英时认为的阶级性的名词,不否认这个名词曾经确实是一个阶级符号,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阶级性已经是非常弱化的了;“知识人”则强调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注重的是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与能动性的发挥。联系本书的研究,主要是论证在现代化进程中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的选择、分化,以及这些选择与分化是如何影响社会现代化

木三分，但是，处在五四运动最基层、最边缘化的小知识人群体则往往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这给“五四”的研究留下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将研究的对象定位为底层的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扭转和扩展党史学的论述视角，是本研究选题的第二点缘由。笔者也愿意打破原有的论述范式和角度，做一些新的尝试。

当然，确定这个选题自然也与个人兴趣密切相关。知识人问题一直是笔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在阅读相关的书籍时笔者就曾感叹：“为什么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学术上绕不开的问题？”就五四运动而言，它以一些先进知识人发起文化运动为缘起，却以一个政治运动来达到高潮；它产生的基本背景是政治上的重重危机，如共和失败、袁世凯复辟、共和政治颓亡等，它却又以一种思想、文化启蒙的方式来对政治进行抗议。基于此来综观“五四”，不难发现其独特性就在于：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环境里，中国在此间出现了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回望这个过程，到底是文化催生了政治，还是政治终结了文化？底层的知识人在这个过程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无法从容以对的问题。选择这样的一个命题，笔者认为可以帮助自己去解答这些疑问，而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与价值也不外于此吧！

毋庸讳言的是，本书的选题乍一看上去与党史关系并不紧密。但新文化运动、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及为什么在1919年之后，知识界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倒戈”的现象等，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形成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做类似的选题也未必不是在丰富和发展党史研究。冗述至此，权为对选题缘由的思考。

对于选题意义而言，它作为学术研究价值衡量的一个标准，笔者期望能达到的高度，不外乎从现实和学术上来阐发。首先，“少年强，则中国强”。初中等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而初中等教育的教师群体是该基石的塑造者。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对政治的认同与否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观和政治品质，进而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本书通过分析五四时期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在新思潮传播中的作用与贡献，给今天的党和

（接上页）的，这反映了初中等教育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因此，在本书中，笔者采用了“知识人”这一说法。

政府提供了重要启示,即要注重提高初中等教育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支持和关心教育工作。其次,教师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教师素质的提升除了依靠外在的经济、政治性因素提供保障以外,还需要内在的精神性的因素来维护其的信仰。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的渗入与涌进,教师群体首当其冲地成为这些思想进攻的“箭垛”。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守护这些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让他们成为抵抗各种不良思想的钢铁战士,是执政党不能回避的问题。最后,在学术层面上,笔者期待的是这样一种反传统的研究方法,能认识到很多理所当然的常识都是“后设”的,而非应然。在肯定宏大叙事方法在党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贡献之余,也应尝试去超越这种研究范式,去寻找一些更深层次、更为客观的研究方法来深化党史学的研究。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群体研究是社会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将群体研究引入党史学的范围,起步较早的是何文成,他于1993年在《北京党史》第4期上发表了《全国“榜上有名”的三支岩石掘进英雄群体》一文。同年7月,孔德明与孔德生在《福建党史月刊》第7期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核心群体形成述略》。而较早论述知识分子群体的是刘悦清,他在1995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中发表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此后曾长秋在《党史纵横》1999年第5期中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群体——1919年前后的中西文化观》,着重论述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不过,对群体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的是刘华清,他于2004年在《湖南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上发表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贡献》一文,后又于2005年、2006年先后发表了《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湖湘论坛》2005年第6期)、《新民学会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试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成长规律》(《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三篇文章,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在党史学研究的范畴内开始了对群体研究的尝试。但是,无论是何文成还是刘华清的研究,他们或是以地域为个案,或是以专业性质为限来进行分析和论证,并

没有将群体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张静如则在《论加强中共党史人物群体研究》(《湖湘论坛》2006年第4期)和《个体的独特作用和群体的合力作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4期)两篇文章中,从理论高度上就党史研究应如何在群体研究的角度上来扩展、深入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高屋建瓴地为党史学的群体研究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但是,如将研究视域跳出党史界,放眼于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群体的研究是比较普遍的。关于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的研究,除教育史领域会有所涉及以外,就算是与党史学最接近的近现代史学领域,目前也没有专门的研究。究其原因,应与两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其一,当前史学研究的思路依旧以重大事件、中心人物的宏大叙事方法作为主要视角,很难将关注点转移到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身上;其二,收集有关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的资料,尤其是关系到其政治参与的资料比较困难。在当时那个政治参与程度不高的年代,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作为政治的边缘群体,很难成为当时社会媒体的关注对象,因此关于他们的记录材料比较零散稀疏,这给相关研究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就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以教师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史料仅《上海教师运动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和《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两册,且收集的材料多为“五四”之后的资料。

然而,如果能把研究视角放开阔些,那么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则非常丰富:其一,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史研究的资料。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1917—192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安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史料选》(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6年编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其二,学生运动史和青年运动史的研究资料。主要有《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学生运动史》(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我国学生运动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广东青年运动史(1919—

1949)》(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学生运动简史(1919—1949)》(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火红的青春——上海解放前中学学生运动史实选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五四与学生运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唐山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其三,各地文史研究。主要有《广东文史资料·五四运动广东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 10 辑》(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五四运动专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湖北文史资料·近现代名人史料专辑》(湖北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中华书局 1979 年版)、《文化史料·第 3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陕西文史资料·第 9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等等。其四,中小学校史与组织史研究。《阿城师范校史(1919—1984)》(出版社不详,1986 年版)、《重庆第七中学校史资料》(出版社不详,1988 年版)、《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等等。

以上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通过对以上研究资料的梳理,可以获得以下四个方面的材料:第一,从宏观上来看,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在五四时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是保守的,还是先进的?第二,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作为知识的传播者,他们对新思潮尤其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持何种态度,并承担了怎样的角色?第三,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与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中间存在何种关系,是默许,鼓励,还是阻止?第四,政府当局对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的态度,是引导还是控制?这些信息的获得,可以说构成了笔者研究的基础。但是,上述研究成果仍有颇多遗憾。其一,研究史料多集中于 1919 年之后的历史,对于“五四”前的资料发掘度比较有限;其二,宏大叙事的历史叙事角度,导致了有关初中等教育教师群体的记录太过于薄弱,只能在相关研究中零星地发现这些历史的碎片;其三,就涉及初中等教育教师的材料而言,也只是模式化的简单记录,对于师生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方式罕有描述。